

学生应知文学知识

港台文学（一）

主编 张俊杰

目 录

台湾文学	1
台湾文学的性质及特点	1
台湾文学的基本性质	1
台湾文学的特点	5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8
台湾文学的孕育期（五四运动前后）	9
台湾文学的摇篮期（1923-1926）	12
台湾文学的成熟期（1926-1937）	20
台湾文学的低潮期（1937-1945）	33
光复后的台湾文学	40
五十年代前期的台湾文学	46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	59
现代派文学的产生	59
现代派诗歌	63
现代派小说	84
本时期的散文	87
本时期的戏剧、电影文学	96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	98
乡土文学的复苏与发展	98
第二代乡土小说家	103
各具风采的女作家	118
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	125
本时期的诗歌	128
本时期的散文	135
本时期的戏剧文学	140
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	146
文学思潮的多元化	146

九十年代文学发展倾向	150
本时期的小说	157
新女性主义文学	166
本时期的诗歌和散文	173

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的性质及特点

台湾文学的基本性质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这块土地上孕育的文学即台湾文学，自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台湾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算是区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局部。它与整个中国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是构筑中华民族文学这一整体的有机部分。虽然由于自然、社会等层面的阻隔，以及台湾在历史际遇、政治境遇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使得台湾文学呈现出较大陆文学不同的内涵和形态，然而这并不妨碍台湾文学的基本性质。

我们今天所谓的“台湾文学”这个概念应该是有时限性的，其时限性是指从台湾被割让、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开始，直到今天处于与大陆相异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质的文学。日据之前的台湾文学根本就不必要独列出来，因为那时台湾的古代文学讲的就是大陆的古代文学，即使是今天，台湾所讲的古典文学仍然是《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如果将来台湾与大陆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

态走向一致，那时台湾文学又将融入“中国文学”的大一统中。台湾文学就像一条蜿蜒流淌的大河在遇到沙洲阻挡时分出一股极小的水流，在绕过沙洲之后，又将汇入主河道。所以当台湾同大陆的文学性质相一致时，“台湾文学”这一概念将成为“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我们研究它时也是作为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股文学支流来研究。台湾新文学史家陈少廷在他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一书的第七章《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中就这样论述道：“很明显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因台湾光复，重归祖国怀抱而永远结束了。台湾新文学本就源自中国的文学，台湾回归祖国，自然就再没有‘台湾文学’可言了。”（参见古继堂：《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都是确定无疑的。

从地缘上讲：在远古时代，台湾位于东海的大陆架上，本与大陆连为一体。大约在两亿二千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海中隆起一座岛屿，那便是台湾。那时华中、华南地区还是一片汪洋，随着时间的推移，至中生代时，华中、华南形成了大陆，台湾从地脉上与大陆相连。在冰河期又数度与华南相接，其间有大批华南动物和以采集狩猎为生的古人类，经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近年来，台湾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左镇发现的“左镇人”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同属三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古人类，有专家推测他们就是由大陆迁徙到台湾的。台湾考古发现的石器、骨器、陶器等，也与大陆各地发掘出的古遗物相似，其中一些已鉴定确认是从我国大陆华南地区传去的。凡此种种皆说明台湾

自古就与大陆血脉相连，渊源深远。

从人种血统上看：从一万多年前，台湾最后一次脱离大陆成为岛屿开始，一直到汉人大量移民台湾为止，居住在台湾岛的人种，无论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长滨人和左镇人，还是新石器时代的山地土著种族或平地土著种族，追根溯源，大多是从大陆移居过去的，属于中国南部大陆的古越族。所以就台湾人来说，只有先来后到之别，而无主宾之分，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地区。

从历史上讲，关于台湾的记载最早见诸文字的是《三国志·吴志》：“黄龙二年（230年），（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即台湾）……”此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派使者或武将抚慰或征讨台湾。台湾与大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基本上是中国附属，只是未正式列入中国版图而已。公元1297年，宋把澎湖列岛划入中国版图，并派兵驻扎。从宋元开始，随着福建开发日臻完成，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泉州港兴起后，海外贸易兴盛，沿海居民东流台湾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当时国内统治暴虐，战火纷飞，动乱连连，大批老百姓移民台湾定居。明朝万历年间，公文上正式使用“台湾”之名。1661年，郑成功赶走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在那里垦荒，开辟了一个反清复明的基地，对台湾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683年，清政府进军澎湖，增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1895年台湾正式建省。但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失利，一纸《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所窃取之中国领土例如满洲、台湾、

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台湾才摆脱日本殖民统治重归祖国。所有这些文献和历史记录，无一不证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文学本身来看：台湾文学有两个渊源，一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一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明朝遗老沈光文被认为是台湾第一位诗人，他不愿做清朝的顺民，1662年飘泊至台湾，受到郑成功的礼遇。他组织了台湾第一个诗社“东吟诗社”。台湾第一位散文家是郁永和，他的传世之作是《稗海纪游》。台湾第一本写实小说是《台湾外纪》。而台湾的新文学则是在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台湾评论家林曙光在评述台湾新文学时说：“本质上它始终追求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倾向，也可以说，它是发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流的一个光荣传统与灿烂历史的支流。”（《台湾的作家》，载《文艺春秋》第七卷第四期。）由此说来，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从文学的载体语言文字上说，台湾方言就是由大陆入台的移民携带而去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台湾的文字是汉字，文学作品使用的语言是汉语——文言文或白话文。总之，台湾作家和大陆作家同文同种，同是描写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同是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和民族精神，台湾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

台湾与中国文学的渊源关系不仅是大陆学者的共识，也是海峡彼岸作家和学者的共识。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叶石涛从台湾历史发展演变的事实，根据考古资料，自远及近地进行研究论证指出，不论是在地缘、血缘还是在亲缘、史缘关系上，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他在《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

向》一文中写道：“拥有几达六十年历史的台湾文学，一直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从来没有脱离过民族文学的立场，所有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觉得骄傲自负。我们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叶石涛：《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中国论坛》，1981年第5期。）台湾另一著名作家陈映真则更为明白清楚地指出：“台湾新文学，受影响于和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之一环。”

台湾文学的特点

台湾是个以汉族移民为主发展起来、并受过多种不同文化影响和冲击的社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台湾文学具有某些与大陆文学稍异的个性，显出其鲜明的民族性，突出的地域性和强烈的兼蓄性等特点。

（一）鲜明的民族性。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开始至“五四”、三十年代乃至当代文学，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传统，这就是真实地反映时代现实生活，同情人民疾苦，针砭社会时弊，反对外来侵略，表现和歌颂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感情。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继承了其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传统，渗透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拥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大陆文学更突出的是爱国主义精神，而台湾文学更突出民族主义精神、独立意识和反抗

意识。这是因为从明朝开始，台湾就不断受到异族殖民主义的侵略，生活在这个岛上的台湾人民向往独立自主的生活。他们心向祖国，与异族侵略者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尤其是在日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全方位殖民统治之下，政治上的高压威逼，经济上的残酷榨取，文化上的强行同化，从反面激发了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民族文化的自卫。在民族斗争和文化斗争背景下，台湾新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高扬文学的现实主义旗帜，表现台湾人民备受殖民主义者欺凌和封建压迫剥削的痛苦，以及他们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这些无不奠定了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由于民族的血缘关系使长期孤悬海外与祖国分离的台湾人民对故土产生深深的怀念之情，因而在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浓浓的“乡愁”。这“乡愁”即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更是历史的。而当历史处于异族侵略，民族分裂的年代，它往往表现为“孤儿”兼“弃儿”的尴尬心境，因而表现出强烈的“孤儿意识”。

（二）突出的地域性。我们所指的地域性既指台湾文学浓郁的乡土色彩，又指传统文化在这儿经历的本土化过程。台湾是一个岛屿，山林茂密，高山矗立，河流湍急，土地肥沃，居住着汉族、平埔族、山地族等多种民族。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形成独特的岛情风俗。台湾岛上渔民很多，乡土小说家王拓的创作就经常以小渔村的生活为题材，还有岛民生活中的“薯”和“笠”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大特色。台湾文学的地域色彩不仅表现在自然风俗的民族习俗的描写中，同时也表现在人物的语言、思想、个性、气质、性格的描

写之中。另外，台湾经历了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发展，定居社会的形成，使原来移民携带过来的中原文化在台湾的播迁中开始本土化，形成其与母体文化不尽相同的地域属性。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在《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一文中指出：台湾虽然保持着我国的民族传统，但外来的文化，也在建筑、村落、语言、音乐、宗教、风俗等方面留下了它的痕迹，这些特殊的历史和自然环境，都使台湾文学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

（三）强烈的兼蓄性。台湾文学兼容并蓄了包括中国文学、日本文学、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等多种风格特点。”五四“以后台湾文学主要受大陆文学的影响，从大陆文学中不断汲取营养，充实自身。台湾新文学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都源于祖国大陆新文学。而冲出封建桎梏的”五四“新文学，向外界借鉴，用以疗救中国社会瘤疾的文学武器主要还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苏俄革命现实主义。台湾前辈作家通过母体文学，将西方文学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等当做自己的学习对象。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大肆推行”皇民化“运动，禁止说汉族、读汉书、用汉文，强行使用日文。台湾相当一部分老中年作家多受过日本殖民教育，对日本文学非常熟悉，因而在创作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和运用日本文学的某些思想观念和表现技巧。台湾光复以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台湾当局惊魂未定，政治危机感严重困扰着他们，他们切断台湾与大陆文化思想上的联系，加强对文艺的控制，文学青年只有向西方文学寻求滋补。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思潮随着美援的进入也大量涌入，形成

一股强大的潮流，对台湾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台湾文学中，中西文学表现艺术熔为一炉，许多作家在文学创作上都有中西合璧的风格特征。当代作家白先勇主张吸取欧美现代文学的精华，在创作中广泛运用心理的、潜意识的、色彩的、音乐的、现代的、感觉的描写，却不脱离社会现实。而享有盛誉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的小说，也不再满足于用朴实、通俗的语言描写具有乡土气息的生活，这些作家将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化为现实主义文学的营养，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台湾文学突出的兼蓄性是与其社会历史条件紧密地联系着的。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从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始算起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台湾新文学的发生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祖国是台湾文学的第一阶段——现代文学阶段，因其全程都在日据时期内，故又称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以光复作为界碑往后为第二阶段，称当代台湾文学。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五四运动前后的孕育期；1923 至 1926 年的摇篮期；1926 至 1937 年的成熟期；1937 至 1945 年的低潮期。

当代台湾文学大致可分为：光复到 1949 年国民党迁台的过渡期；五十年代前期；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

台湾文学的孕育期（五四运动前后）

台湾早在二十世纪以前，就有了诗歌。追溯其深长的历史渊源，不仅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郑成功建立政权后，清代文人官员的吟咏唱和，还可远溯到台岛最初的原住民的歌谣创作。当然那时的台湾文学是同大陆文学一体的，毋须特别提出。真正台湾文学的独列，应从其特殊的历史际遇导致它在中国文学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算起。1895 年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使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从此，台湾同胞开始了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探索。

1919 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刚好为了急于寻求民族解放路的台湾同胞指出了明确而美好的方向，台湾思想文化界的先驱决定紧跟“五四”历史步伐，用新思想发起启蒙运动。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1919 年秋，一批留学东京的台湾青年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人联络大陆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马伯援、吴有容等，为响应“五四”号召，取“同声相应”之意，成立“应声会”。这年末，日本又出现了“启发会”。会员互相交换有关促进台湾社会改革的意见。但以上两个团体都因组织不健全，成员不多，不久即宣告解散。1920 年 1 月，在蔡惠如的号召组织下，成立“新民会”。林献堂、蔡惠如分别任正、副会长，会员有一百多人。“新民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会员们为谋求台湾同胞的幸福，争取民族自治、自决与自主的权利，深入开展社会政治改革活动。为了联络同志，启发民智，该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台湾青年》，这是台湾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一份启蒙刊物，此外他们还

致力于谋求同祖国的联络与合作。该会在唤醒民族意识，反对专制统治，为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在岛上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要推动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文化组织。民主主义战士蒋渭水牵头于 1921 年 10 月 17 日在台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协会推举林献堂为总理，杨吉臣为协理，蒋渭水自任专务理事。”文协“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化政治组织。该组织拥有会员一千零三十二人，网罗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当时台湾的青年才俊，成为当时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主干。台湾文化协会的宗旨是改革台湾社会，灌输民族思想，唤醒民族意识，以摆脱殖民统治，进入文化抗日的新阶段。为贯彻其宗旨，该协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各地设立报刊杂志阅览室，陈列台湾和大陆的各地报纸杂志；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演讲，涉及内容广泛，有台湾历史、中国文学、日本经济、通俗法律、西洋通史、新闻学、社会学等；他们还组织文化剧团到各地演出，激起民众的批评和斗争意识。台湾文化协会实际上已成为推动全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23 年 4 月 15 日全部采用白话文的《台湾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这是一个综合性文化刊物，它原属《台湾》杂志（前身为《台湾青年》的增刊）。该刊的办刊宗旨是：“用平易的汉文，或是通俗白话，介绍世界的事情，批评时事，报导学界的动静，内外的经济，提倡文艺，指导社会，联络家庭与学校……启发台湾的文化。”《台湾民报》成为提倡、推动和普及白话文的坚强阵地。该报从创刊起就积极介绍大陆新文学的理论与作家作品，指导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如陈独秀的《文学

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都曾全文转载。对它的历史功绩，叶荣钟曾做过如下表述：“第一白话文的输入与应用是其最大功绩之一。第二因为台湾民报的努力，台湾的知识分子与五四以后的民族精神的思想文化才能连接，而发生影响与鼓励作用。”（李南衡主编：《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集》[上]，第220、226-227页。）

在台湾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最早出现于1922年。早期的白话文学作品多用日文写成，模仿多于创造，而且新文学作品数量稀少。诗歌方面最早出现的是追风用日文创作的《诗的模仿》四首，这是新诗最早的尝试，包括《赞美蕃王》、《煤炭颂》、《恋爱将茁壮》、《花开之前》，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年发表的新诗还有施文杞运用中文白话写成的送别诗《送林耕余君随江校长渡南洋》。小说方面有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给苦恼的姐妹们》、无知的《神秘的自治岛》、柳裳君的《犬羊祸》、施文杞的《台娘悲史》、杨云萍的《月下》等不多的几篇。其中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引人注目，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作者原名谢春木，1902年生，台湾彰化二林人，曾任《台湾民报》主笔。该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台湾姑娘桂花爱上留日学生清风并由家长做主订下婚约，谁知清风已有恋人，要求同桂花解除婚约，桂花经过痛苦的婚变，燃起自救救人的思想，东渡日本留学。小说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婚姻制度给青年心灵造成的莫大伤害。《神秘的自治岛》以寓言的方式揭示民族悲剧问题的症结。以上诸篇作品在艺术技巧上尚处于尝试阶段，但都有面向社会人生的写实作风，在主题上也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倾向。

台湾文学的摇篮期（1923-1926）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是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始的。

从二十年代初起，一些有识之士就撰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当时，《台湾青年》就刊发了三篇此类文章。第一篇是陈发表于创刊号上的《文学与职务》；第二篇是甘文芳发表于第三卷三号的《实社会与文学》；再有就是第四卷第一期陈瑞明的《日用文鼓吹论》。这三篇文章是最早提出改革旧文学取用白话文的文章，但因文章只是零散发表，以议论和感想居多，很少触及新文学的具体问题，尚未形成体系，因而没有引发强烈反响。不过他们引发了文化界对白话文学的酝酿与关注，可以说是替白话文呐喊的先声。

1923年1月，在日本留学的黄呈聪和黄朝琴分别撰文《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发表于《台湾》杂志上。这两篇文章是他们在回祖国考察，对祖国大陆新文学有了切身的感受之后写就的。他们想借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经验推动台湾社会改革。以此为转折，台湾新文学开始与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取得联系，并展开热烈的活动。

1924年4月21日，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文章以犀利的言辞对台湾文坛上舞文弄墨的旧文人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同年11月又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向旧文界的新人发起猛攻，斥责他们“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

无遗，甚至还埋没了许多有学问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泼的青年”。这样直接而又尖锐的抨击打响了向旧文学发起进攻的第一枪，迫使旧文学界仓皇应战。台湾旧诗坛老将连雅堂在自己主编的《台湾诗荟》上，借为林小眉的《台湾咏史》作跋之机，攻击新文学：“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又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字可废，汉字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针对连雅堂的谬论，张我军立即著文予以还击，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他表示要“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而“欲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非先把诗界的妖魔打杀”。

张我军这种“赶尽杀绝”，必“先除之而后快”的气概招来更多反对者的围攻。自此，新旧文学的论争愈演愈烈。旧文学派，以郑军我、蕉麓、赤嵌王生、黄衫客、一吟友等为代表，利用旧文学阵地《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攻击谩骂新文学。新文学派以张我军、赖和、杨云萍、蔡孝乾等人为代表，将《台湾民报》作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半新半旧生的《新文学之商榷的商榷》、蔡孝乾的《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赖和的《读台日报 新旧文学之比较》、杨云萍的《无题录》、张我军的《随感录》九篇等。通过这场规模空前的新旧文学论争，新旧文学的利与弊一目了然，促进了旧诗人行列中爱国文人的觉醒，加速了旧文学的灭亡，新文学显示出必然的勃勃生机。尤其是1925年以后，新文学运动由理论主张转向创作实践，练就了一批有影响的新作家，新文学创作因而开始初具规模。

最早显出实绩的是新诗，张我军这名文坛骁将，既是活跃的理论家，又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兼小说家。1924年8月，杨云萍发表《这是什么声》，1925年赖和发表《觉悟下的牺牲》，这都是当时诗坛很有影响的作品。由杨云萍和江梦笔创办的《人人》文学杂志在第二期（1925.12）集中发表了一批新诗，主要有杨云萍的《夜雨》、《无题》、《泉水》；纵横的《乞孩》、《小诗二首》；鹤瘦的《我早手软了》；肖梅的《唐棣梅》；郑岭秋的《我的儿》；启文的《夜哭》；梨生的《小疑》；泽生的《思念郎》、《海滨白骨》；崇五的《误认》、《旅愁》；杨华的《小诗》、《黑潮集》；虚谷的《卖花》等，这些诗作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诅咒黑暗的社会，揭露虚伪的人生，抒发对爱情的追求，讴歌光明和胜利，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诗作大都主题单纯、集中；语言鲜明泼辣，格调清新流畅。

新文学创作中小说的成绩最为突出。具有纪念性的作品有：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黄昏的庶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等。这些小说被认为是新文学的奠基之作。有“台湾新文学之父”之称的赖和的小说拉开了新小说创作的序幕。赖和与张我军，杨云萍并称为台湾新文学初期的“三杰”。此外还有一些新人新作问世，如天游生的《黄莺》、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等。

与此同时，散文与戏剧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台湾“文化协会”组织演出队到各地巡回演出戏剧，对现代戏剧却寥若晨星，现在可见到的只有张梗的独幕剧《屈原》和逃尧的《绝裾》。散文方面，赖和的《无题》和蒋渭水的《狱中日记》堪称代表作，前者还是公认的台湾